

员交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和“救亡团”一起集体参加“民先”。

1936年春季开学后，先是由雷骏随（李昌）在旧大楼“清华学堂”（一院）二楼东翼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民先”的成立大会。“车社”成员集体出席。会上，

选出雷骏随、高葆琦、凌松如、董凌云、纪毓秀为负责人，雷骏随为清华“民先”的大队长（雷调离北平“民先”总队长后，纪毓秀继任）。从此，我们积极参加“民先”的一切活动，在党的指引下，走上更加广阔的新的革命征程。

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队员名录

钱伟长（研究院 物理），郝威（罗青）（1936 外语），高葆琦（高原）（1937 土木），裴崑山（彭平）（1937 地学），张石城（1937 级电机），陈冠荣（1936 化学），吴瀚（1937 历史），誉问德（1937 化学），高崇照（1937 地学），戴振铎（1937 物理），梁伯龙（1937 化学），任泽雨（赵心斋）（1937 地学），徐煜坚（1938 地学），黄克新（1938 化学），黄渤海（1938），沈海清（林一民）（1939 经济），凌松如（凌则之）（1939 电机），高仕功（1939 气象），伍崇让（1939 电机），郑仁圃（1939 化学）

（刊载于《纵横》2000年3期、4期，2015年12月吴瀚女儿刘爽提供）

王笠耘、袁榴庄夫妇的清华情怀

○袁榴庄（1949 经济）、袁叶口述 杨帆整理

王笠耘（1927—2008），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同年冬天，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为纪念惨案中牺牲的四位烈士，于1946年转入外国语言文学系，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小说《同命人》。1951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该出版社的元老之一。1955年担任现代文学部北方组组长，在工作中始终致力于帮扶边远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学事业，仅内蒙古一地就采风二十余次，被誉为内蒙古文学的“奠基人”。一生编辑出版著作200多部，著有中篇小说《春儿姑娘》，长篇小说《她爬上河岸》，理论专著《小

说创作十戒》，诗集《心花飘香远方》等。

袁榴庄，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曾是学校排球队队长。1951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是该出版社的元老之一，也是现代文学部唯一健在的元老。在工作期间共编辑出版了60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1973年，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屏，剧中小海霞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蔡明。

2015年9月，编者有幸在“一二·一”运动70周年之际采访到了袁榴庄学长和他们的子女袁叶。这对清华伉俪的故事就在母女二人的讲述中慢慢呈现。



一九五七年王笠耘袁榴庄夫妇

袁叶讲述 我父亲从小就酷爱文学，14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是他报考大学的时候，就想将来当一名技师，报效祖国，所以他就报考了西南联大工学院的电机系。

考上电机系以后，他本想能安心学习，但是没想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又发起了内战。那时候昆明西南联大，还有云南各大院校的师生召开了集会，还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组织了纠察队。当时一个纠察队的队长叫张祖道，他后来成为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他跟我父亲不是一个系的，但是因为都爱好文学，所以互相认识了。张祖道那个时候当了一个纠察队的队长，他召集了一帮湖南老乡，还有学校里的块头很壮的学生当了纠察队员。但是他没想到文弱书生的我父亲也来报名参加。我父亲在清华毕业的时候，还欠着体育课的学分呢！没拿满，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那时候拿

着棒球棍，日夜巡逻。我爸爸回忆起当时的事情，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差点就没有你们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为什么呢？就是12月1日那天，他们纠察队的队员，还有别的同学一起用桌椅板凳把学校大门后面都给堵起来了，而军警特务就往里面扔石头。后来有个军警特务就丧心病狂地拉开了一个手榴弹，手榴弹就在门外爆炸了，他们在里面只听见了一声爆炸声响。正巧那时候云南南菁中学的年轻教师于再从那儿路过，说：“你不能往里面扔手榴弹！”这时候军警特务就把手榴弹投向了，这就是“一二·一”惨案牺牲的第一个年轻人。这是1945年的事情。后来到了第二年，1946年的时候，联大恢复了清华、北大、南开。我父亲回到清华以后，1946年的12月1号，在清华举行纪念“一二·一”惨案的祭奠会。我父亲参加这个祭奠会以后心潮澎湃，又悲伤又激动，他那时就想，将来要写一部反映“一二·一”的长篇小说。他原来是工学院的，他为了要写小说，就转到了外国语言文学系。

转系之后，我父亲曾经旷过三个月的课，他每天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到一个特别大的木制结构的教室里头，教室里就亮着一盏电灯，我妈妈说连灯罩都没有，就是忽悠悠的一个灯泡。我父亲一个人就在那里写小说，晚上通宵达旦地写，写完以后，早上大家都去上课了，他一个人回宿舍睡觉。这样三个月下来以后，他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做《同命人》。讲述了一个青年华侨回国后，先到了沦陷区，然后又转到后方国统区，本以为到了后方就可以安全了，但是后来看到了国民党的很多黑暗面，最终他投奔了解放区。我父亲就是

通过这个青年华侨的工作、爱情和生活，刻画出了一群同命人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不同遭遇。这部小说一共写了15万字，当时我父亲年仅19岁。那时候他选修的课有当时很有名的教授李广田的写作课。旷课三个月以后，他把这部小说给了李广田老师。李老师看了以后不但没有批评他旷课，还表扬了他，同时还在班上对同学说明了他旷课的理由是创作长篇小说。他对这部小说很赞赏，就推荐我父亲把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那个时候我父亲还选修了钱钟书老师的英文散文课，他把这个作品也给钱钟书老师看了，也得到了钱老师的肯定。

1951年，我父亲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955年他就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北方组的组长。他当组长以后，对组里的同事，比如家里孩子很多的人，我父亲就把他们分配在离家近的地区，比如北京片儿。而他自己选的都是些边远地区，内蒙、新疆、青海等。我父亲仅内蒙古一个地区就出差了有二十多次，扶持当地的文学创作。他非常喜欢蒙古族人的粗犷、



王笠耘 70年代后期在采访内蒙鄂伦春族时留影

豪爽、朴实的性格，我出生以后，我父亲还给我起了一个“乌兰”的小名，内蒙古语是红色的意思。在我父亲任职期间，在他的辅导和帮助下，这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出版了很多长篇处女作，有不少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还有一些获得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学奖。内蒙古作协主席在大会上称我父亲为内蒙古文学的“保姆”，还有的作家称我父亲为“内蒙古作家之父”。他这一生编辑出版著作200多部，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儿姑娘》，长篇小说《她爬上河岸》，理论专著《小说创作十戒》，诗集《心花飘香远方》等。

1980年12月1号，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和纪念“一二·一”运动三十五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会场上，很多当年联大的学生们唱起当时联大的歌曲，我父亲听了以后非常激动。回来以后，他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提议出一本《一二·一诗选》，得到出版社同意后，我父亲就和他的同事到云南去收集资料。那是很难收集的，因为当时很多都是贴在墙上的，风吹日晒之后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走了很多地方，收集了不少当时非常珍贵的资料。我父亲编的这个叫做《诗的花环》，同时也是《一二·一诗选》的代跋。

后来我父亲退休以后，他打算创作三部长篇，一部就是原来的《同命人》，他想改编以后再出版；第二部就是以“一二·一”为题材的小说，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写这个小说；还有一个就是他想写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这个就是通过五个女劳教人员身边发生的事情，反映文革及文革结束以后的中国社

□ 口述历史

会。从时代角度来讲，还是先写文革题材的比较好。然后我父亲就写了这部名字叫做《她爬上河岸》的长篇小说，一共写了80万字，后来又反复推敲，最后改成了近60万字。我父亲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改了又改，结果整整花了16年的时间。由于这部小说花的时间太长了，等他准备下一部，梦寐已久地想写“一二·一”这部作品的时候，突然发了心脏病，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袁榴庄讲述 我们家出了五位清华人，除了我和我先生王笠耘之外，还有我的侄子袁随善（1938 土木）和侄媳妇成莹犀（1939 土木），还有一个侄女婿陈耕陶（1934 化学）。每次家里聚会，我们五个人总是凑在一起，其他人就说我们开“清华校友会”。其实我和清华的缘分是在更小的时候，大概在七八岁吧，那时候就是我侄子袁随善，他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带着我们全家女眷来逛清华。当时给我印象

最深的，一个是礼堂，还有一个是气象台。我们全家在礼堂前集体照了一张合影，后来到气象台，上去以后，哎呦，这气象台怎么这么高啊！当时的北京没那么多树，也没楼房，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北京城，灰蒙蒙的一片矮房子，这给我的印象特深。

我逛了清华回去之后就想，将来我一定要上清华。说到气象台，我接着就讲气象台。1948年解放前夕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垂死挣扎。那时候他们对清华非常仇恨，派了好些特务，据说是要来打清华，当时我们都不敢进城，因为城里的军警一碰见清华校车就砸，就不让我们回学校了。后来我们女生宿舍，就是静斋，楼道两旁设了好多用树枝做的路障，两边都摆了很多。那时期我们女生就在静斋食堂吃饭，男同学晚上值班，在清华各地点守卫，保卫清华。女同学晚上去慰问、送粥，所以晚上我们就熬粥，大锅大锅地熬粥，热气腾腾，然

后就派人去送。清华校园很大，派的又都是女同学，就两个人一块儿去，就派我和同学何淑贞一块儿去。可偏偏派给我们的那个地方是气象台，气象台我不是对它印象最深吗？但是到清华上学以后，我没到气象台去过，因为我觉得气象台离静斋很远很远。而且当时的清华不像现在灯火通明的，那时候晚上灯光很少，所以路上很暗。我们俩提着饭盒，拿着碗筷，两个人拉着手走在路上，没有人，阴森森的，而且就见那个路灯照见两个黑影，更害怕！



80年代初，袁榴庄（左1）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左2）去南方组稿与基层干部座谈

路上也没见着一个人，因为好像是一点来钟了才去送。结果到了气象台，还没到那儿呢，HOU！就一声吼，把我们俩吓坏了。就是那男同学喊的，他也害怕，怎么来人了？

我毕业以后，正好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结果我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我一共呆了三十多年，一直到退休。我在里面做编辑工作，在小说组、散文组、理论组都呆过，都是做编辑。现在，过了快七十年了，现代文学编辑部创始人只有我一个了。当时我编辑审稿一共发了大约有六十多部，我就说一个：《海岛女民兵》。那时候是50年代末，我们都要到各地去组稿，部里派我一个人到南京去组稿。那时候组稿就是到当地有创作地的组织，比如作家协会，等等。那次我就到了部队，南京军区的创作组，因为那里有创作人员。创作组里有胡石言，就是《柳堡的故事》的作者。我到那里跟他们了解，他们说创作组还有一个人，没怎么出书，而且现在生病，得肝炎住院了，见不到他。我一听，不行，我得去，我也不管什么传染不传染，就到医院去看他。到那儿以后，看见黎汝清正躺在病床上。后来我就说明来意，他挺兴奋，跟我到休息室谈了很久，给我讲他要想写这个《海岛女民兵》的故事，我越听越有兴趣。我跟他讲，你病好以后，一定要写出这本书，交给我，交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也挺神气的，是国家一级出版社，而且黎汝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长篇。后来，他病好了，就给了我这部书稿。那时候长篇著作很少，有影响的更少，所以那时候也很缺剧本。这本书出版之后，

各地的剧团纷纷拍成各种地方戏，演出的有十几个；外文出版社也把我们这本书要去了，翻译成外文，销售国外。到70年代时，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海岛女民兵》，当时演小海霞的就是那个蔡明。

我和王笠耘是在清华认识的，后来又一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钱钟书教授曾经是王笠耘的老师，他写的《围城》解放前是在上海出版的。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想出版了。那个时候王笠耘已经是现代编辑组的副主任，因为他跟钱钟书的师生关系，就让他陪着编辑到钱钟书家组这个《围城》的稿。一见面之后，师生非常亲近，那个编辑就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熟悉啊？这么多年了他们谈得这么热乎，而且还谈从前在学校的事：王笠耘想起当年钱钟书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讲的话，王笠耘就用英文说给老师听。钱钟书说，喏，这么多年你还记得。那句英文的话如果翻译成中文，意思是说，钱钟书当年对同学们说，你们女同学，将来要搞对象，别找大作家，大作家有才，但是生活无情趣；小作家呢，生活有情趣，还有点才。说完他们一起大笑。钱钟书后来还给夫人杨绛说，喏，几十年了他还记得，我都忘了。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袁学长一直记挂着母校，她在采访结束之后又重游清华园，在初秋午后温暖的阳光中回忆起当年读书时的情景。在她娓娓的话语中，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年代的校园，看到她，看到王笠耘，看到他们那一代清华人的执着与奋斗，感受着他们对母校的情怀！